

開羅會議的檢討

——專題講演

梁敬錚教授

吳主任、各位先生：今天得這一機會和諸位見面，榮幸得很。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吳主任各位副主任主持之下，國際學術地位逐年增高。今天我參觀貴所的圖書室，環境清靜，設備合適，在台灣各學術研究所中，還不多見。照這樣的不斷進展，貴所前途，不可限量，這是我可以預賀的。

我自執筆論世以來，已經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一九一八），我很快地就寫了一部「歐戰全史」（一九一九），出版之後，雖也經過了名家和讀者的鼓勵，但在五十年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內重新看到此書，就覺其中膚淺疏漏，不一而足。我於是感到寫一部史實，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真正史料才會發現，「率爾操觚」、「急就成章」的辦法是要不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今已結束了廿五年，我雖然也曾蒐集材料，打算寫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但是至今還不能殺青問世。今天這個專題——開羅會議的檢討——只是我八年前一部「開羅會議與中國」的修補，將來如有機會，我打算將這修補資料，印一專書，請各位指教。

開羅會議是第二次大戰中四強高峯會議之一①，參加的元首和執政為蔣介石主席、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其日期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二日至廿六日。就背景論：那時中國是甫經莫斯科會議宣布的四強之一，蔣委員長也正是同年八月經過黨中央常會公選，繼林故主席森而為中國的元首。就戰爭過程說，那時對於德日的戰事，都已佔有勝算，問題不在誰勝誰敗，而在德日投降的早晚。就會議結論說：我們除應該收回甲午以來日本侵略的土地——台澎和東北四省——之外，美國還答應過九十師軍隊的全副裝備，也答應過十億元貸借的原則。我們國際地位真是一百餘年來所未有的了。

然而就實際來說，開羅會議當時，也正是我們國際關係走入下坡的開始。中英間的隔閡，中蘇間的敵對，甚至中美間的罅痕，也都在那時逐漸發現。中美關係在開羅會議以前，至少面子上還能水乳交融，而在開羅會議以後，則距離漸見。要挾、凌迫、猜疑、背棄，都開始發生。近釀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的出賣，遠啓一九四六年美國軍火的停給，所以美國治史學人，研究中美近代關係，都說開羅會議乃是中美關係由高峯轉入低潮的分水嶺②。我們撫今追昔，就不得不將造成這分水嶺的原因予以推究，這是今天本題目開講的旨趣。

造成開羅會議時代中美關係分水嶺的因素，是因為美國對日戰略的改變。美國對日立場，在珍珠港事變以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纔和我們一致。當日本南進，控制泰越，危及荷印，專使來栖和大使野村對美最後談判之時（一九四一年十月），赫爾國務卿因為馬歇爾參謀長先有對日軍備尚未充實的警告，尙打算跟日本訂立臨時條款，以日本不威脅中南半島的條件，換取日本處置中國事件的自由，因為蔣委員長激烈反對，英蘇兩國又都希望美國捲入對日戰爭的漩渦，美國纔最後拒絕了日本臨時協定的要求，引起了珍珠港的事變，但在珍珠港突襲以前，美國也不是對於遠東戰事毫無準備計劃的。早在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在歐發難進攻波蘭的時候，美國就想到萬一德日同時侵略，美國應該如何自救？那時美陸軍部內的「作戰計劃」是艾森豪將軍主持，在他手內製出一個機密軍略，那就是霓虹計劃 Rainbow Plans。這計劃分戰事為五段，其中第五段 Rainbow V（霓虹五）③，就是應付德日同時侵略的準備。照他們主張，如果德日同時侵略歐亞，美國應該先以全力打倒德國，後打日本。他們的理由，一因德國工業基礎雄厚，日本比較薄弱，如

果先打日本，則美國雖然對日戰勝，而國力疲敝之後，必至不能再勝德國；並且萬一對日戰事持久，便將給予德國以充分的時間，來整理控制歐洲的果實，來製造新武器的機會。因為這種邏輯，歷史上有名的「ABC-1」先歐後亞政策，乃告成立④。這政策決定在一九四一年三月，距珍珠港事變九個月，距德國攻蘇也還有三個月。

先歐後亞的美國軍事戰略，便宜了蘇聯，吃虧了中國。如果沒有這個戰略，戰後的中國，決不至赤化，整個遠東歷史，便要重新寫過。這戰略決定的時候，中國獨力抗日已歷四年，精銳軍隊已經打盡；東北四省製造了偽組織；南京出了偽政權；英國封閉了滇緬路，蘇聯對日，締結了中立條約，我們國際貿易幾全斷絕，外匯全缺，所有軍火武器，僅憑着滇緬空陸微弱的一線，對日作戰有隨時崩潰的可能；美國軍事家並非不加關心，但因種族淵源，和地理遠近的關係，亞洲對美的利害，究竟不如歐洲利害的關切，這先歐後亞的政策，就畢竟實行了！

但是這政策的實行，也不是沒有經過驚濤駭浪。珍珠港事變起後，美國人民憤恨日本過於德國；深謀老算的邱吉爾，看到這種情勢，恐怕美國要將準備援英援蘇的物資兵力，先移作攻日之用，變更了先歐後亞政策，於是在珍珠港事變後的兩星期，他就趕緊帶了英國大批軍事幕僚來美，重新檢討戰略。這就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七日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的華盛頓 Atlantic 會議。但是出乎邱相意外地，美國軍事幕僚和羅斯福總統，對於先歐後亞政策都仍然堅持，邱相心中一塊重壓的石頭，算是消化了。但是同年（一九四二）四月，對歐戰略英美幕僚發生歧見，英國幕僚主張先攻北非，由地中海先破意大利，剪除希特勒的伙伴；美幕僚主張先在北法登陸，開闢第二戰場，以救蘇聯的危急。馬歇爾憤於英國的堅持，一度主張移兵太平洋先攻日本，先歐後亞政策幾乎變化，不幸此主張不為羅斯福所贊成（羅斯福理由是打敗日本還是要打德國，而打敗德國之後，日本可能不須一戰而即投降），先歐後亞政策經此風波之後，就始終穩定，不再改變了⑤。

先歐後亞政策，在當時中國對日作戰筋疲力盡之後，自然加重了中國崩潰的危機，這一點美方並非不曾重視，因此之故，當年 Keep China in the War 的口號，美國就高唱入雲，五億美元的政治借款，卅師的訓練和武器裝備，租借物資空運噸位的逐次增加，陳納德飛虎隊飛機的繼續供應，乃至不平

等條約的廢除，莫斯科四強地位的提攜，都是美國維持我們作戰的苦心。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我們輒次經過日本最兇惡的戰事，雖然節節挫折，但仍能維持戰局，美國的飛機、汽車、卡車和其他軍火的支應，是大有幫助的，然而美國幫助我們對日作戰，也並非就為了中美的友誼，她的主要理由，自然還是為了自己的軍事利益。

美國的軍事利益有兩層，第一是要我們在美國對德戰事未了之前，羈絆住日本在華的一百餘萬大軍，不使其出擾於太平洋，使美國得有佈置太平洋反攻的餘暇，第二是利用中國的地形和人力，藉為她其後對日進攻的憑藉。美日國境隔着一個太平洋，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公約以後，西太平洋已非美國所能問津；珍珠港突襲之後，美海軍力量就已縮到阿留申羣島、所羅門羣島、珊瑚海以東。戰艦、飛機的損失，還可日日補充，海空軍據點的喪失，就不能立刻回復。日本緊隣是中蘇，所以打擊日本，中蘇基地是最必要的憑藉，然而蘇聯自和日本訂立中立條約（一九四〇）以後，絕對不給美國絲毫軍事對日的便利；德軍攻蘇（一九四一年六月）之後，美國雖然竭力援蘇，而蘇聯還是不許美國在東西伯利亞設置飛機場，甚至連測量氣候的飛行，也藉故推宕不肯答應。於是美國能夠打到日本的路線，就只有中國了。這是中國地形的需要。美國對我第二需要，便是兵源。中國士兵，耐勞吃苦，鬥志堅強，美國軍人所知道的。美國對日作戰的動員，雖然可到一百萬人，然而隔着一個太平洋，運輸補給，人力財力都甚重大，美國雖然富庶，人力却甚缺乏，因此我們的兵源就成了美國對日戰略的要素。美海軍上將金氏，在卡薩卜欄加高峯會議開會時（一九四三年一月），盱衡對日作戰，就將中國兵源對美之軍事需要鄭重提出，可見我們當時雖然力疲財盡，而其戰場尚足邀美國之重視者，就全在其地形與人力之兩點。

但是這兩點的重要性，在開羅會議那年，就都減退了。我們今日知道，在開羅會議前兩個月，羅邱和英美幕僚先有一次魁白克會議，在魁白克會議時，意大利已經要求投降，英美軍事幕僚知道對德戰事半年內必可了結，對日戰事必須加緊，否則要受到國內民衆的責備，於是定出對德戰勝後十二個月內擊敗日本的最高軍事政策，從前所擬的對日作戰方略，都要按照這最高政策，從新檢討。美國當時對日作戰方略，原有五路，（一）第一路自夏威夷出攻阿留申羣島。（二）第二路自千島羣島出攻日本本州。（三）第三路

自中太平洋取馬林那羣島為基地，以新出之B-29遠程轟炸機轟炸日本。(四)第四路由新幾內亞越過拉布爾奪菲律賓，循香港台灣獲得中國海口，與中國陸軍會師，向華北進擊日軍。(五)第五路規復南北緬，打通中印陸海通路，以大批軍械裝備中國軍隊，出擊廣州與香港。第一第二兩路因係海戰，無利用中國地形與兵源之必要，第三路在初期亦無需中國戰場之助力，故其能夠利用中國地形人力者，只有第四第五兩路，此五路方案與英方幕僚研究後，認為一、二、五、三路都需要蘇聯與中國軍隊之助力，蘇聯協力，暫時尚無把握，中國協力固無問題，但中國陸軍，必須先加訓練與裝備，而此工作需要時日，緩不濟急。經過再三檢討，認為攻日路線，合于最高政策的只有三四兩路，然此兩路，則都不必藉重中國之兵源與地形，中國戰場經此檢討，就喪失了戰略價值。

中國戰場對日戰略價值失去之後，中國方面之十億貸款要求，裝備九十師要求，都不能得到美國的同意。這是開羅會議後中美合作關係之一大轉變。我們今日自美國軍部所編的戰史中檢討資料，知道自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間，美國參謀幕僚減低中國戰場價值之說帖，竟有十次之多，其經過如下：

(一)一九四三年九月廿八日 裝備中國第二批卅師案，美軍部認為不應全部担認，其理由有三：①事實上不需要，②增加美國過份負擔，③對德戰事解決後，美國在歐剩餘物資可以移用，毋庸另撥，為應付中國政治要求，只允再行裝備三師。

(二)一九四三年十月 美國幕僚認為奪取中國南部口岸，繼續北上攻日之方略，與中太平洋由馬林那島轟炸日本之海上兵略有出入。利用中國基地人力，就要訓練中國軍隊，而訓練中國軍隊，需要時間，殆非至一九四六年——四七，不能使用，顯屬緩不濟急。

(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 分析中國戰場之戰略地位，認為中印緬戰場之約束不可增加，裝備中國軍隊只宜以卅三師為限。

(四)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根據戰略測斷聯合委員會之意見，美國應以中太平洋為攻日之中心，分南北兩翼打擊日本。無需中國之基地。

(五)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 英美聯合參謀幕僚長會議，決定對日作戰之主戰場應在太平洋，其他戰場只應與相配合。

(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裝備中國軍隊九十師案，應緩實行。

(七)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 美軍部作戰司重核中國戰場價值，認為中國戰場只應成為支援太平洋戰場之基地，中國空軍力量可予培養，中國陸軍裝備則宜從緩。

(八)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 參謀部核議，認為美國對於中國戰場所耗之軍事費用，在政治上雖或有價值，在軍事上只宜視為呆賬。

(九)一九四四年四月十日 美國作戰司核議，認為攻日進展，海面比陸路大見迅速，故對華援助，只宜限於空軍，以配合中太平洋之攻勢。

(十)一九四四年五月廿七日 馬歇爾覆告史迪威，今後中國戰場只宜以支援中太平洋與西太平洋作戰為主⑥。

十次說帖，前四次發生在開羅會議以前，後六次發生在開羅會議以後。此一變化，不獨影響十億元貸款與九十師裝備兩大案，就是南北緬水陸夾攻日軍的方案，也因對日戰略側重中太平洋海路之改變，受到英國的破壞。英國不欲中國統一強盛，尤不欲中國軍隊收復緬甸，妨及英國在緬之威望，我們早可推見。但南北緬水陸夾擊案擱淺之後，羅斯福翻却其暫緩一年會攻緬甸之前議，迫我雲南出兵，甚至以停撥空運物資為要挾，則出意外。我們檢討史實，又知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此種壓迫，竟有五次⑦。世人皆知一九四六年馬歇爾來華，逼建國共聯合政府，以停止運華軍械為要挾，坐使中國大陸淪於共黨，大貽美國今日之害，而不知一九四四年，馬歇爾已曾用過同一之手段以壓我國，特其時我方接受壓力，出兵赴印，遂免去中美一九四四年中美關係之決裂而已！

不但如此，美國於上述軍事壓迫之外，更加上政治壓迫，政治壓迫係以國共合作為對象。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副總統華萊士來渝，即係傳達此種之使命，在轉達的時候，華萊士明言美國並不一定只支持國府，這聲明今日已見於美國一九四九年對華之白皮書。而當時具體的壓力，則係以派遣延安美軍視察團為對象。此壓力表面上雖由於羅斯福之電文，事實上則係出自於史迪威指揮部政治顧問戴(維斯)謝(偉志)集團之勾串，今亦有其建議說帖可為佐證⑧。毛澤東曾告謝偉志，謂此延安美軍調查團之派遣，一方面可以消除國軍襲擊延安的危險，一方面又足打擊國民黨政治之地位⑨。史迪威去職後，毛澤東一度曾擬秘密赴美，與羅斯福面談武裝中共軍隊之事，雖係

出自駐滬美軍官與史迪威指揮部中人之勾搭，但其禍根則係出自延安軍事調遣團之派遣。

總之，開羅會議以前，美國因為採取自中國陸地擊破日本的戰略，所以看重中國之地形與兵源；開羅會議之後，美國因為改採中太平洋基地以海空兩軍進攻日本本土之戰略，遂不需要中國之地形與兵源。在看重中國地形兵源之秋，美國對我有求多應；在不需要我們地形兵源之時，美國對我不但有求必駁，並且還不顧我們本土的危急（其時日本已以鉗形攻勢剪取我們平漢粵漢之要衝），強迫我們出兵北緬，以策應美國中太平洋之戰事。這是開羅會議前後中美關係的變化。諸位如果把握此點，則不但對於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我們權益何以被賣，可以了解，就對於戡亂時期，我們何以失敗，也可以尋出答案了。

註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邦高峯會議共有十四次。邱吉爾參加十三次半，羅斯福十一次，史達林五次，蔣主席及杜魯門總統各一次，英首相艾德禮半次，詳見拙著「開羅會議」（未刊）。

②參看U. S. Arm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Chapter 14, 及 Stilwell's Commander Problems, PP. 49—82.

③參看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Chapter 1, The War Plans, Washington Command Post, PP. 56—58.

④參看同上書 Chapter 3, British-American Plans.

⑤參看同上書 PP. 273—283, 又 Sherwood: Roosevelt & Hopkins, P. 605.

⑥參看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51, 55, 70—73, 75.

⑦第一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80.)，第二次十二月十九日 (Ibid., P. 297.)，第三次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第四次一九四四年三月廿日，第五次四月四日 (Ibid., P. 310.)

⑧中美關係文件（一九四三）頁三九七至三九九。

⑨ The China Tangle, Herbert Eies 著, P. 162.

⑩ 見魏德邁報告書。

開羅會議的檢討

（上接第58頁）之情勢。蹲在戰後的廢墟裏，失去一切信心的日本人，已從失望中翻醒過來，邁向世界經濟強國之林。這種情勢將會挽回日本人過去所失去的自尊心 and 優越感。無論日本之防衛整備計劃，起自保護海外投資之權益，抑或國防上的實際需要，擬消除因戰敗引起的屈辱感，日本也許只有一意孤行，擴大其經濟力量 and 軍事力量。

本年十一月廿五日在日本發生了轟動中外的三島事件。這個事件的主角三島由紀夫是曾經幾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他率領了其所組織的「橋之會」的四名會員，衝進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部，把總監益田謙利監禁，並向自衛隊員演講，呼籲修改憲法，敦促自衛隊員採取行動，以改變方式改革政體，維護天皇制度。當三島演講時，在下聆聽之自衛隊員，噓聲四起叫罵不絕。但三島講畢，脫去上衣割腹自殺後，大家才認識事態之嚴重性。翌日自衛隊員在三島自殺之原地點，以菊花奠祭追悼之情形以觀，這事件或許會在右翼民族派之學生，或自衛隊的青年軍官，防衛大學的學生之間，引起共鳴。就三島之上述動機和行動加以考察，要達成其政治目的，或許有更佳之辦法才對。設若三島以其現有的名望和地位競選國會議員，以國會議員身份利用種種關係，出長防衛廳，並伺機統率親信實行政變，或許可以達到其目的。總之，這件事只能歸因於三島個人的思想和性格使然。三島生前常說：「思想和精神，最初並不能期待其成效，但經過十年左右，必會發生作用。」本年十二月十日，日本朝日新聞透露一則消息謂，在衆議院內閣委員會之議席上，有詢及由三島事件引起的影響問題者。對此，中曾根防衛廳長官答稱：「該事件對國內青年之衝擊，較諸預料者更為深刻。事件發生後，來自各地的電話纏綿不絕，譴責我的談話對三島過於刻薄」等語。這是由思想所掀起的事件，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後，也許會出現某些形態之反應。

總之，由三島事件之影響，加上日本青年組成之勝共大會及亞洲反共聯盟大會的鼓吹，日本的右翼勢力業已伸展到戰後二十五年以來之頂點。今後日本國內政治運動之原動力，也許會由左派手中轉向右派手中，亦未可知。

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日本戰後二十年史（辻清明編著 政治過程篇）。二、東洋經濟週刊——三四九八號。三、朝日年鑑一九七〇年版別冊。四、縮刷讀賣新聞之重要紙面（一九六八、九——一九六九、八）。